

十三經索引

樂貴明 田奕 主編

· 第一冊 ·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十三经索引 / 栾贵明, 田奕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10

ISBN 7-5004-4052-9/K·590

I. 十... II. ①栾... ②田... III. 群经合辑—专书索引
IV. Z12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74320 号

封面题签 钱锺书
责任编辑 胡 靖
特约编辑 陈 杰
责任校对 陈 非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sspw.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4 年 3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4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开 本 16K
印 张 380
字 数 9100 千字 印 数 1-2500 册
定 价 158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十三經索引編輯職員名單

顧問	朱邦復	沈紅蓮		
主編	欒貴明	田奕		
助編	陳飛	薛斐		
機臺	胡天寶	陳飛	封家麒	陳俊廷
	邵增威	陳立堅	李昇隆	楊仲仁
	林伯勳	殷建國	高崇倫	姚德龍
	林坤政	王建三	岳英	任文正
文案	薛斐	高靖	張雲娟	崔昌喜
	董秀鳳	梁相如	吳娜	吳惜青
	劉志宇	李靜娜	周松梅	李壽梅
	劉紅奎	王洪英	席建新	解樹辛

十三經索引基本數據

經名	用字量	字數	句數	參檢句數
周易	1418	21078	5875	20898
尚書	1992	26480	6189	26193
詩經	2964	37379	8890	36054
周禮	2224	49436	10506	48652
儀禮	1529	56838	12648	56190
禮記	3017	98366*	21827	97143
春秋左傳	3303	197481	45219	195746
春秋公羊傳	1638	44328	9750	43450
春秋穀梁傳	1594	40847	9435	39913
論語	1355	16012	3852	15766
孝經	388	1905	401	1888
爾雅	3429	10662**	3730	10335
孟子	1905	35428	7327	34902
合計	6606	636223	145649	627130

*據阮元本載宋監本《禮記》字數為 97759（按分列字數計為 94851）

**據阮元本載唐石經雪牘本《爾雅》字數為 10809

序

今年十月二十五日，經國家行政管理部門批准，朱邦復先生擔任院長的北京文信傳文史研究院成立，既沒有慶典，也無人恭喜，於今之世，十分新鮮。第二天清早，案頭放著一份“十三經逐字索引編製計劃書”，別開生面令人振奮，我暗暗為主持此事的同事和後輩晚生喝彩。時隔二十五天，六千頁的《十三經索引》“審閱清樣”，整整齊齊碼放在我面前。隨附便箋一紙：

先生：知今要日。昨夜趕工，索引得成，三校已過，約計九百萬字，六千頁。請審讀賜序。

知名不具十一月十九日晨

所謂“要日”即錢鍾書先生誕辰。今編畢待梓，撫稿思人，舊情映目，不禁感慨繫之！本院的業務骨幹均為青年才俊，新鮮的知識和無窮的能量令我欽佩。近十年，在我們共同主編和排版的含有三千多萬字的《唐詩索引》三十種，二千二百多萬字的《全唐文新編》以及另一部五百餘萬字的學術資料著作時，早已領略。但這部《十三經索引》完成的速度和品質，仍令我吃驚。感佩之餘，惟諾而已。是為之序。

十三經作為我們民族最古老、最完整、最可靠、也是最重要的文獻，在中國文化、中國歷史和每個中國人精神世界中所佔的地位，是無法替代、不容爭議的。其維繫和發展多民族團結進步的潛在能量，更不可忽視或抹殺。

《十三經》，即十三部經書的結集。其中包括《周易》《尚書》《詩經》《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傳》《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論語》《孝經》《爾雅》和《孟子》。所謂結集，大體經歷了向前追溯的三千年歷史。孔子是春秋時代的偉大思想家，他一生“述而不作”——祇整理闡發古代文獻，對“文獻不足”者絕不“言之”——“一以貫之”為“仁義禮智信”。這和我任本書主編，編輯不編，校對不校，電腦程式不寫，掛虛名不一樣。至於當今假藉專權，夫妻店常開父子兵上陣，與聖賢大德謬託知己，廣攬南北各路豪傑自封學壇明主，熱火朝天也破綻百出的那些事，離師祖愈顯遙遠了。孔子一生編輯並整理了諸多古代典籍，確如《後漢書·范升傳》所記“五經之本自孔子始”，他並未署名，版權至今多存爭議。但誰都知道《易》《詩》《書》《禮》和《春秋》五經裏，都有他的貢獻和勞作。對於這些經典，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有最權威的定義：

《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

要編十三經的索引，應深入瞭解十三經，特別需要關注以下三點：

其一，古典經書的排列次序和種種變化，與帝王君主的依重和政治的需要直接相關連。政治的當權者們一貫主張“五經聖人所制，萬事靡不畢載”（《漢書·劉宇傳》），逐步形成“不遵五經之法言”（《漢書·郊祀志》）和“非五經之正術”（《漢書·劉宇傳》）等罪名，又由此而派生出諸多律條：“非九經書疏悉禁之”“詔除九經外，餘書不得出界”（《宋史·食貨志》《神宗本紀》）之類。於是本屬於經文或解釋的學術性分歧，突變為恩寵獲罪、升遷跌落、治罪殺頭乃至滅門九族的因由。專制者的一孔之見，往往成為經文是非的主宰。在閱讀、研討、使用這些經典之際，對這個背景，編者和使用者都不可不知，亦不可囿於其中。不知則不得明，囿於其中則不能明。

其二，十三經經文形成本已十分複雜，漢代又攙入今古文之爭，是非正誤的矛盾衝突與日俱增。譬如《易》有連山、歸藏，以及卜商、京房、高氏、梁丘氏、施氏、孟氏、費氏諸家。《尚書》有濟南伏生尚書，有歐陽尚書及大夏侯尚書、小夏侯尚書。《春秋》有左氏春秋傳、公羊春秋傳、穀梁春秋傳，又有嚴顏二氏春秋。《禮》已有三禮，又置大、小戴禮等等。《後漢書·徐防傳》中記有傳主提出建議：“五經久遠，聖意難明。宜為章句，以悟後學。”實際是官方的動員令。再加之教育制度易隨人意，弟子雖未結業出門，幫派已明，死不相讓，經學形同封建割據。此後便是經外的釋家蠶起，為經文作注，為注做疏，為疏又做正義、箋注、通義、索隱、考證、章句、訓詁、音訓、集注。刻石製版之後，脫漏錯訛更不一一。千百位學問家，爭鳴於一枝，筆伐乎字句。面對經與注種種歧義，越來越亂，越亂出書就越多。解經文字造成了經典正文沒頂之虞。居於顯學的經學，幾乎成了不堪民族重負的文化難題。早在《後漢書·章帝紀》中便載光武帝詔曰：“五經章句煩多，議欲減省。”許多有志學者，歷來對其進行大量工作，像明永樂間就有“頒四書五經大全，廢注疏不用”的提法（《明史·選舉志》），至清《四庫全書》在書籍整理中設立“存目”一項，雖有多種弊病，也別有用心，但總算順帶解決了經書注疏繁冗的問題。當今有許多大學者又建議進行這方面的工作，除去重複內容將是重要目標。要實現此目標，合理有效地使用中文電腦，發揮它的查檢、移動、排比和綜合功能，應是必由之路。通常的機上查檢當然不敷使用，必需引進漢字的高智能系統，方能事半功倍。題外話，不多說。

其三，由漢初開始形成的“射策”即科舉制度，推動了對經書的注釋、整理及應用。“射策”的甲乙科需“總五經之眇論”（《漢書·儒林傳》），“考論五經”（《王莽傳》），“要合五經，苟非其事，文不虛生”（《揚雄傳》）。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經書和科舉制度緊密黏合，並逐步滲入社會生活的各方面。後漢博士范升在上疏中追稱將軍祭遵“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又建為孔子立後，奏置五經大夫。雖在軍旅，不忘俎豆”（《後漢書·祭遵傳》）。到魏明帝，又在詔書中提及此事說：“昔祭遵為將，奏置五經大夫。居軍中，與諸生雅歌投壺。”（《三

國志·張邵傳》)此舉頗似當今勞軍、慰問團或軍中設牧師之類。服役期內曾在康樂隊擔當號手的朱邦復先生，恰合五經大夫之稱也。經書由此而得以向軍事方面擴散。王權政治需要經書，科舉制度離不了經書，打仗用兵經書也幫得上閑，於是經書離開生之養之的文史哲根基，憑空而起，身價百倍。這有如中國古老的墓葬制度，造就了兩個絕不相同的行業，即文物考古學科發展和古玩器物走俏一樣。十三部經書的特殊境遇，對存留、精整這批古經典發揮了令人欣喜的副作用。當然，研究者對異化功能必須冷靜分析，既要使經書回歸到文化的本屬——剔除歷史發展過程積納的污垢；又不能因其曾被利用，曾被玷污，在清掃封建妖孽過程中而將我們的寶典深葬銷毀。我們應該辯證地評價異化現象。

充分認識十三經的重要歷史意義，衝破其種種局限，編輯一部方便準確的索引工具，是深入整理工作極其重要的第一步。為編好索引，我們應對十三經的由來有大致的瞭解。

“五經”是一個貫穿了封建時代的稱謂。較早見於《管子·五輔》篇的“五經即布”。嗣後，“五經”載入《史記·樂書》：“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皆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乃能通知其意。”至《漢書·武帝紀》云“五年”（公元前136年）“春，置五經博士”，武帝採納了董仲舒所謂“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漢書·董仲舒傳》）實乃後稱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舉。五經博士之類官職一口氣延續了兩千年，是人類政治史一大奇觀。

在“五經”成為通名的漢代，同時還有六經、七經和九經的稱謂。關於“六經”的較早記載是：“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史記·太史公自序》）。“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漢書·武帝紀》）。“六經之道同歸”（《漢書·禮樂志》）。“六經離析”（《漢書·董仲舒傳》）。置“六經祭酒各一人”（《漢書·王莽傳》）。一說“六經”即“六藝”，前引《太史公自序》可證。此說與《樂》的去處似乎有關，此後《隋書》《周書》及新舊《唐書》等正史中多有六經之稱，又似與《樂》無關，難置定論。

“七經”一稱較早見於《史記索隱》引秦密云：“文翁遣司馬相如授七經。”《宋史·邢昺傳》記昺侍上講“孝經、禮記、論語、書、易、經、左氏傳”七經。但其傳內又稱，昺“舉五經”，“擢九經及弟”。而《李至傳》又於五經之外，稱“二傳、二禮、孝經、論語、爾雅七經”云云，則實為十二經，經數幾成不定矣。

“九經”之稱，在《漢書·藝文志》中便有“易、書、詩、禮、樂、春秋、論語、孝經和小學”的記錄。正式記載始見於《北史·崔氏傳》中，崔氏曾親授《九經》義於子。此後的兩《唐書》、《舊五代史》以及《宋史》多次載有“九經”的提法。《孟子》是宋刻九經時才增入的，朱熹整理注釋經書居功至偉。至清代刻印《篆字九經》，實溢出為十經。惠棟所刻《九經古義》又將《左傳》排出“九經”之外。總之，在結

集的過程中，經典的上上下下，分分合合，既反映了古代思想的“道籍經，經載道”的紛爭事實，又記載著十三經的形成和發展的繁複過程。

自從孔子之後，經書的流傳和整理中值得研究的問題很多，尤應注重的是對經書各次刻印。如《後漢書·盧植傳》有“時始立太學石經，以正五經文字”；《宦者傳》有“與諸儒共刻五經文字於石”；《儒林傳》有“熹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在一部正史中三書石刻經文其事，可見份量之重。《舊唐書》《新唐書》中又多次載有“文宗開成二年十月鄭覃上石壁九經”事。在唐以後的五代時期，經籍的擴大傳播，推動了雕板印刷技術的成熟，從而在更大範圍內促進了經籍的整理、印刷和傳播。關於這方面材料，最重要的當推王溥《五代會要》。王溥（公元914~974）字齊物，後漢乾祐中舉進士甲科，入宋前任左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入宋，任太子太保、太傅、太師，封祁國公，《宋史》有傳。所修《五代會要》以宮內史料為主，親身經歷為輔，翔實可信，為《五代史》所本。《會要》卷八共有三條有關經籍刻印的重要記錄，應全文引錄。其第一條是：“長興三年（公元932年）二月中書門下奏：‘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板，敕令國子監集博士儒徒，將西京石經本，各以所業本經句度，抄寫注出，子細看讀。然後顧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隨秩刻印板，廣頒天下。如諸色人要寫經書，並須依所印敕本，不得更使雜本交錯。’其年四月，敕差太子賓客馬縞、太常丞陳觀、太常博士段顥、路船尚書屯田員外郎田敏，充詳勘官。兼委國子監於諸色選人中，召能書人端楷寫出。旋付匠人雕刻，每日五紙，與減一選。如無選可減等第，據與改轉官資。”第二條是在十六年後：“漢乾祐元年（公元948年）閏五月，國子監奏見在雕板九經內有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四經未有印本，今欲集學官校勘四經文字鑿板，從之。”第三條則在二十四年後：“周廣順六年六月，尚書左丞兼判國子監事田敏，進印板九經書、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各二部，一百三十冊。”上稱“六年”似應作“三年”，“周廣順三年”即公元956年，據《舊五代史·明宗紀》改正。《舊五代史》原書久佚，後經四庫館臣由《永樂大典》殘本輯拾。輯本在基本收錄了以上資料的同時，還引用了大典本《愛日齋叢鈔》中存留的幾則筆記，使我們可以不費力氣地增加資料。其中如《通鑑》有“蜀母昭裔出私財百萬營學館，且請板刻九經，蜀主從之”；有“周廣順三年六月丁巳”進印板九經書之舉；有王明清《揮塵錄》所記此事為“監中刻書之始”；有朱翌《猗覺寮雜記》云“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後唐方鑿九經”；有《柳氏家訓序》云，於中和三年（公元883年）親見“雕板印紙浸染不可盡曉”，恰與今存咸通九年（公元868年）《金剛經》單頁印品相為輔證；又有沈括（存中）謂“板印書籍，唐人尚未盛行為之。自馮瀛王始印五經。自後典籍皆為板本”。此條見《夢溪筆談》卷十八關於畢昇發明活字印刷術權威記載中。所說馮瀛王，即那位處於亂世三入中書、事四朝、相六帝的馮道，馮可道。恰恰這位曾言“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的王公，是長興初力主向皇

帝上表刻印九經，出方案、定人選、“後進賴之”指“前程”的幕後大人物。這些有關中國印刷史大事件的證據被一網打盡。據此可以斷定公元九世紀中葉，我國的雕板印刷逐漸發展，至五代時期逐漸成熟，宋代已成規模。目前科學史普遍認為，在中國印刷術已成熟並進入實用的四百年後，西方纔開始印製他們的《聖經》。歷史和文學不同，它從來排斥主觀和個性，蔑視孤證推理乃至對文獻的曲解，更不會度量人們良善用心撥快或調慢自己的時鐘。這就是歷史。動盪紛亂的五代十國時期，歷經二十四年雕板印刷的九經，將作為人類文明標誌而永載史冊。此後，疆內海外，臣民賓朋，紛至沓來，請賜經典；皇帝頒賜大典的盛禮也蔚為大觀。精美的雕板經書，遠勝金銀財寶之類貢品，獨占鰲頭。

直稱書名《十三經》，見於史籍正式記載較早者當在《明史·趙倬傳》中：趙於“洪武六年徵授國子博士”，“帝曰：‘汝等一以孔子所定經書為教，慎勿雜蘇秦、張儀縱橫之言。’諸臣頓首受命。倬因請頒正定《十三經》於天下。”百餘年間，明嘉靖間豐坊有《十三經訓詁》，萬曆間有黃鳳翔的《十三經註疏》等，都是有影響的版本。在《明史》黃某本傳中的一段記載，較為準確全面地記述了他“較刻十三經註疏”的目的，很有代表性：“頃陛下去《貞觀政要》，進講《禮經》，甚善。陛下讀曾子論孝曰敬父母遺體，則當思珍護聖躬。誦《學記》言學然後知不足，則當思緝熙聖學。察《月令》篇以四時敷政、法天行健，則可見聖治之當勤勵。繹《世子》篇陳保傅之教、齒學之儀，則可見皇儲之當早建豫教。”當今絕不會有人再贊同此類宏論，但它將作為校勘刻印十三經的證據而存留。

我們今天整理出版十三經正文的目的，是為它編製一份完整週到方便的索引，輔助文史研究，並期運用科學的手段為科學研究服務。隨著“與國際接軌”時態，展示悠久而古老的文化優勢，以增強民族自信心，發揚中國人智慧勤勞勇敢自強不息的優秀品質，繼承數千年來仁義禮貌誠信等美德。汲用古典會使我們溫故而知新，胸懷開闊，目光彌遠。充分民族化是國際化的基礎。古典文獻，堪稱民族文化之源頭。故編此《索引》亦有普及古代經典的用意。

清嘉慶二十一年，江西巡撫阮元以家藏十行宋本的十一經，加入更早的北宋蘇州刊本《儀禮》和《爾雅》，並參照他自己的《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編成《十三經注疏》，堪稱學林善本。其原本經世界書局縮版影印，中華書局訂正了一些誤漏後於一九七九年再次影印，至一九九八年又有浙江的影印本。本索引的編製以較晚的通行影印本作為底本。

確定方向和目標之後，方法是關鍵。方法中首要是索引對象即索引源的確立。本索引以十三經的正文作為先導，印於每部索引之前作為直接索引源。這樣做有三重意義：一，獨立成書，不必再翻揀他書，方便讀者直接查找。二，藉此機會將十三經正文做一些整理，比如“字形相近而又意義相同”的異體字統一等。三，表明我們對十

三經正文的尊重。我在此就十三經正文和“邊緣經解”關係舉一個小例——“中庸”之誤解，證明只有經典正文纔是可靠核心，而未經汰選的各式各樣“經解”怎樣誤人。至於“正式經解”，有文字在，自有後人評說、利用和信奉。

《論語·雍也》：“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荀子·王制》：“中庸，民不待政而化。”兩部大書，同樣僅一次提到“中庸”。

查許慎《說文》：“中，和也。”（清代學者段玉裁注：許書原作“和也”當作“內也”。反證許氏原作“和也”。）《左傳·定公元年傳》：“未嘗不中吾志也”。《戰國策·卷二》《史記·周本紀》所云“百發百中”。其“中”字，均用《說文》沿用至今的“和”即“合”義。再查許慎《說文》：“庸，用也”。別無它解。

《禮記·中庸》的核心意義是：“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由此看來，“中庸”最古老也是最簡明的定義是：君子決策要符合客觀，行動要準確纔合用，即“中節”“中時”“按規律辦事”之謂也。大量歷史記載證明，我們的先輩對此一直明明白白。比如唐代的重臣、元和間的縉紳羽儀權德輿在他的《書紳詩》中說：“先師留中庸，可以導此生。”在《百巖大師碑》中說：“以中庸之自誠而明，以盡萬物之性。”他在另一篇墓誌中對此做了最鮮明的解釋：“中庸之居易，知前古之善敗，稽六學之義類，靈龜恬然，天爵自貴。”三段文字把“中庸”推上了頂峰之終極。此外，在南北朝魏有人說“中庸與凡才”（元順《蠅賦》），將“中庸”與“凡才”對立而舉。還有人說“根中庸之至德”（韓愈《省試顏子不貳過論》）；“吾自得友君子，而後知中庸之門戶階室，漸染砥礪，幾乎道真”（韓愈《與呂道州溫論非國語書》）；“是不得由中庸以入堯舜之道”（柳宗元《非國語序》）；“德契中庸”（張說《大唐西域記序》）；“窮太一之道，踐中庸之德，確乎高尚”（李隆基《徵隱士盧鴻一詔》）；“依乎中庸，遠棄偏黨。垂至道於萬國，寄良政於百官”（孟萬石《對文雅麗策》）；“秉中庸之德，含光大之量”（獨孤及《唐故洪州刺史張公遺愛碑》）。袞袞諸公對“中庸”一詞的內含和外延的理解，毫無差異。事實證明二千多年來這個詞與孔子原意並無二致。中庸的意義正合於古希臘亞里士多德所謂“中道”：“中道行為使人成功”“美德乃是一種中庸之道”“德行就是中道”（《尼各馬可倫理學》），中庸或中道是人生至高無尚的道德境界；也通於釋家主張的“中道”——“無中道故不見佛性”“中道之法名為佛性”（《大般涅槃經》）“行中道，是為般若波羅密”（《大智度論》）。中道是釋家各宗派共識的根本立場。至於那個將中庸離譜地解為“調合折中”的貶意，我不知自何人何時而起，更不知何故而將與此並無關連之“好好先生”“批倒鬮臭”。正如《左傳·僖公四年》所云“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這樁公案很可能像先師在《管錐編》裏充分論證，已

被公認的“宗教”是“鴉片”的錯案一樣，也會鑄成百年誤解。若干年後為新學派的利益，或許會得以“平反”，或許另有新解。據我遠處觀察，不少清代以來的文獻研究者或學者專家，對原始證據並不重視。他們或不看，不查，不核；或聽而不聞，視而不見；更有甚者，或添文解經，或刪字著文；黨群偏激，自以為是，貽害多年。因此，編輯一部中庸——即合用的十三經經文索引，以追本溯源，大有必要。

第一部《十三經索引》，是我崇敬的先輩大師葉紹鈞（聖陶）先生編製的。開編於1928年秋，歷時四載出版。在戰火硝煙中，他祇為了“每有所遇，似曾相識，而隸屬何篇，上下何文，往往弗省”的“經語”，免“牧人偵亡畜”之苦；“於人至便”而甘“寒夜一燈，指僵若失，夏炎罷扇，汗濕衣衫”。這是多麼感人至深的偉大人格啊！想起不久前有人在海上一張大報嘲笑“編索引”的人，可以肯定這位專家編不出索引。他本領或許不少，只缺葉老所說的“大雅所不屑道”的眼光和德行。

本文史院的《十三經索引》充分借鑒了葉聖陶先生的成果。與葉先生《十三經索引》相比，本索引有如下的新進展。

第一，本索引將十三經分做十三部分，即為每經編製一部索引。索引由每句首字方式擴大為逐字方式，即對該經的每一個字都可以查檢，不致因編者讀者斷句的分歧而使查找坐空。隨著檢索源的增強，索引篇幅必然加大。如果堅持採用十三經統編方式，又無為讀者著想的措施，必將造成海量數據堆積，其查檢困難程度肯定會超過對原書的查找，得不償失。目前市場上的機編新索引，往往有這種令人哭笑不得的狀況。當然，本索引仍有幾個高頻辭彙，如“子曰”“象曰”之類，尚有改善餘地，方案亦已成型。但改善的前提是要符合使用者的習慣，要尊重科學邏輯。改革和進步有時會比革命來得困難。我們寧可慢些，不得造次。考慮到十三部經的相互印證查找，正如漢宣帝所期“詔諸儒講五經同異”（《漢書·宣帝紀》），很有必要。故本索引附編有針對十三部經的統一字表，一個以四角號碼為序，一個以筆畫筆順為序。讀者通過其中任何一個字表，都可以得到該字在十三部索引中的全部位置，從而彌補分經索引的美中不足。當然，最便捷有效的是使用朱邦復先生主持研發成功的“漢文史資料庫”。本書中另附一頁《十三經索引統計表》，提供許多不易見的數字，或許會引起讀者的興趣，或許是新研究課題的起點。數字歷史學、數字文學和數字語言學都已悄然興起，數字文獻學出台，還會久嗎？

第二，本索引以阮元編輯的《十三經注疏》為底本。考慮到底本異體字的繁複情況，如果從文字學角度出發，可以原字照錄，保存可靠的原始資料，但會造成索引的嚴重割裂，一字兩處三處，給使用者陡增不便。因此在嚴格控制下，對部分異體字，像“群”和“羣”，“恆”和“恒”，“昏”和“昏”，“贊”和“贊”，“嘗”和“嘗”，“鷄”和“雞”，“簡”和“簡”，“廐”和“廐”，“厨”和“廚”，“柰”和“奈”，“却”和“卻”，“練”和“練”等字進行了必要的統一。對這類

異體字在索引字總表上標出某字見某字，使被歸併的異體字，不致沉埋湮滅。在句讀方面，考慮到本索引採用最週到的逐字索引方式，分歧的斷句也不可能造成漏檢，在句讀處一律改作“。”。對少數句讀過長和過短的句子，區別“句”和“讀”不同情況，在不違語義原則下，適當做調整，做到能提供更多信息。分段標題處置除依據底本外，汲取參照學者研究的部分成果。為方便查找，避免重複，節約篇幅，也進行了一些新的加工。比如《詩經》的小標題改後置為前置，《周禮》《春秋左傳》的小標題採取就地另起行的方式，《爾雅》的分段格式採取了限制方法等。經文正文的小標題使用黑體字印刷，單行列於文內，以求醒目。對於底本所附與正文有關考訂，在充分考慮用字的分歧、儘量尊重底本的原則下，適當採用，但不增設異文和小注，避免繁蕪等等。總之，對原文採取嚴格審慎的原則，方便讀者是根本的目標。排列於每部索引之前的經文頁面，其右側數碼為本頁行數，其左側數碼為影印阮元底本某頁碼開始的位置；每頁書眉按常規標有該經經名、該經索引頁碼和該篇篇名等等。

在這項工作基本完成之際，我建議將以上內容改稱作《使用須知》。所謂《使用須知》就是工具資料一類書籍的《凡例》。不能不改的原因是，多有讀者、編輯對法規性質的《凡例》視而不見，造成許多筆墨和心力的浪費，改題《使用須知》或許可能會有改善。

第三，葉老在《自序》中曾說：“四角號碼檢字法已有國際地位，為學者所稱道，此書列次宜採用之”。遺憾的是“排植已達十之八，未能易轍耳”。時過七十年，這本新索引，完全依照葉老的宏見，採用王雲五先生的四角號碼檢字法排列，並設有按四角號碼和筆畫編製的索引總表，以利各有擅長的讀者使用。我在此必須說明的是，王雲五先生於1926年在胡適之先生幫助之下完成的四角號碼檢字法，對中國文化和科技事業做出過重大貢獻。特別是在當今數字化（或稱數位化）的大潮中，這一發明的地位和影響越來越重要。1929年胡適之先生在他的《四角號碼檢字法序》中說王雲五先生是“學問界的恩人，我們都應該感謝他們，敬愛他們”。而且一再強調“他新發明的檢字法確實是一個很重大的貢獻”。並贈以沿用至今的“歌訣”。繁雜的字理，成了一首易學好記朗朗上口的歌謠。應該說那是文學化的科學楷模，也是科學化的文學典範。王雲五先生的發明，至今由於種種原因，其中也包括若隱若現的政治原因，還沒有人站出來公正地評價這一重大發明。令讀者不平的是，與王雲五先生有著特殊關係的商務印書館，《四角號碼新詞典》五十多年來版本有十幾個，我手頭有1950年8月初版。1954年8月32版。1956年2月43版，印數已達2,695,000冊。1958年1月43版17次印刷，印數又達4,225,000冊。1982年12月北京9版。1986年5月香港版等。還有幾個版本未出版權頁。印刷上百次，印數早已超過千萬，但無一處提及王雲五先生，似乎這項發明來自天外。顯然，這一社會現象起碼可以揭示出三個問題：一、王雲五先生的“四角號碼法”被現代社會公認是漢字直接數字化最優秀和廣泛採

用的方案；二、王雲五先生故於 1979 年，他的發明冠名權被漠視，既有政治掩飾下的經濟利益，也有經濟遮蔽著的政治偏見；三、法治強大，法制脆弱，惟道德遠及古往今來。偏見容易糾正，法制也可以健全，道德建設對社會來說很困難。但就個人或一個出版社來說並不難。

本文史院院長朱邦復先生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把第一個漢字系統裝入了美國人發明的電腦，創造出世界上第一台中文電腦。他還發明了倉頡輸入法，對漢字數字化也做出永垂青史的貢獻。由於他和王先生同樣尊重漢字的源和流，確定以字形方式（包括部首）為依據的五位碼法，順暢而巧妙地全面解決了漢字數字化難題，並且一以貫通地利用漢字基因理論，在漢字識別和理解系統裏，打開了西方語言文字無法涉足的新天地。朱邦復和王雲五先生不但技術基礎同源——深深植根於漢文化傳統，而且做事在這一點上也極其相似——以技術發明為公器，放棄了一切版權收入。所不同的是朱邦復有向全世界宣佈“棄權”的壯舉。因此，字典用的四角號碼法和電腦用的倉頡輸入法兩項漢文化大發明，任何人都可以隨意使用。但是，他們始料不及的是，學商們禁不住手癢，無償用了人家的發明，發明人的姓名遭迴避，“專利”也被傷筋動骨地改造一番，面目全非。王雲五先生已乘鶴西歸，不會搭理我們的事。但我們得向朱邦復先生鄭重建議，倉頡輸入法抄的抄了，用的用了，改的改了，有如春秋戰國，局面已經大亂。勞您大駕出面規範董理，漢文化圈期之久矣。為負責計，就是決定著作大權復位，亦理所當然。

《十三經索引》編製採用巨大壓縮比的超大字庫，使《爾雅》以及甲骨、金文、帛書、竹簡一類“天書”仍得以字符狀態高速準確的運行環境，居於電腦科學技術的最前列。這些新技術成果是由朱邦復先生和沈紅蓮女士提供的。據精確統計，此次編就的《十三經索引》，正式使用漢字 6605 個，參見字 92 個，總計 6697 個。在《國標漢字集》（GB2312）僅可找到 4167 個，其中有數百個被簡化了的。天花水月的景觀，謝靈運、庾信以來，百餘位大師，行文吟詩，代有歌詠譬喻。如若假藉“標準字庫”來處理這些珍貴古代文獻，缺東錯西，定如唐朝公億乘在文德元年（公元 888 年）所稱“能使天花散地，水月澄空”而已。中華文化這個大寶庫，中華古文獻是核心，記錄文獻的漢字無疑為寶中之寶，它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我們當好自愛惜。沒有漢字的中國，會成為無根之木，無源之水，國將不國。朱邦復先生將漢字成功裝入電腦，喚醒了漢字消亡的噩夢。隨著電腦科技的前進，漢字在全面數字化之後，識別和理解的智能將在漢字基因理論推動下，一天天強大。中華文化隨著漢字的振興，前景無限。

本索引具體編輯工作由田奕小姐統領，排版工作由陳飛小友執行。我馬齒徒增、髀肉復生，權作壁上觀，深為新一代文史研究工作能插上科技的翅膀而高興。當然，一項新技術的產生和發展，必然會遇到嶄新的問題和困難，也可能會出現不可逆料的誤漏。雛鷹有時飛得比雞低，但經過不懈努力，他們定會凌雲高飛。1986 年 6 月人民

日報出版社出版《論語數據庫》一書，錢鍾書先生為我修改《前言》時，曾親手寫下鞭辟入裏、語重心長的一段話：

從理論上來說，計算機和人類使用過的其它工具沒有甚麼性質的不同。它在還未被廣泛使用的時候，除自身尚待完善以外，總會遭到一些抵拒。慣用舊家什的人依然偏愛著他們熟悉的工具。有了紙墨筆硯“文房四寶”，準還有人用刀筆和竹簡；有了汽車、飛機、電報電話，也還有不惜體力和時間的保守者。對新事物的抗拒是歷史上常有的現象，抗拒新事物到頭來的失敗也是歷史常給人的教訓。

十一月十九日是錢鍾書先生的誕辰，出版這本書是他十年前的希望，他認為這個項目是文史研究的基礎工程。他還為我題寫了兩個書名，挑了一個他認為好的，鼓勵我早日完成這項任務。在胡繩院長，丁偉志、楊潤時等領導的關心鼓勵和支持下，半年內中國社科院計算機室編排完成了《易經》《詩經》和《尚書》三種索引的印製清樣。錢先生看了非常高興，並提出了方便讀者的建議。當時參加這項工作的還有林滄、張朝範、陳抗、陳肩先生，任紅、蔡文莉和孫小玲小姐等。曹辛之先生的夫人趙友蘭女士還為該書設計了優雅的封面及裝幀。本已水到渠成，但是功虧一簣，似乎應了“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的古箴。一場無妄之災，雖在錢先生和我估計當中，竟意料之外地銷磨掉我七年時光。有如杜工部所云“天上浮雲如白衣，斯須改變如蒼狗”，又如太史公所曰“盛夏六月，天為降霜”，我的正常研究工作被打斷，數據收繳，書稿散落。為中外科技界矚目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計算機室，全歸一位司機師傅領導。萬幸有神靈庇祐，錢先生題簽得存。楊絳先生請求領導，借走田奕小姐。當時電腦科技一日千里，我心祇求不能落伍，焚膏繼晷，將勞補逸，差堪自慰。最近，一位應該是瞭解內情的人士，在報上著文婉稱這個獲得國家科技進步獎的成果仍“深居閨中”。豈知深閨依然在，昔人去已遠。三年前，視若無覩充耳不聞的冤情照例被不了了之，但我得以國家級有突出貢獻專家身份提前退休。遂應朱邦復先生盛情相邀，進入文化傳信集團，晉材楚用，甘之如飴。協助朱先生完成漢文化大業同時，不敢一日忘懷錢先生的囑托。今天，有朱先生支持，幾十位青年文史工作者一舉在文案和機臺上完成了這項重任。我似乎又見錢先生那帶有幾分神秘、微露狡黠，而又浸染著天真的經典笑容了。

最近，有位教育家不贊同小學生讀《弟子規》，認為“我們不應該提倡和古人接軌，應該提倡和國際接軌”。我從未研究過《弟子規》，更沒當過教員，本無發言權。我只覺得“古人”和“國際”，有如侯寶林先生所演，一個關公，一個秦瓊，真會翻將報端，開打出手？危言高論，不敢苟同。誰都明白，《弟子規》較之《十三經》，小巫大巫而已。祇期望本書的勞作者能夠知曉，科學既無捷徑，更無坦途。

樂貴明 2003年11月20日

使用須知

- 一、《周易》《尚書》《詩經》《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傳》《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論語》《孝經》《爾雅》《孟子》是我國古代重要經典。清嘉慶間阮元據宋本校勘重刻，稱《十三經注疏》。後經世界書局、中華書局和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本索引以通行的三個影印本為底本，自立頁碼，使用時不必置備底本。但經文附標有參見中華本和浙江本的頁碼。十三部索引各自獨立，不設貫通頁碼。為照顧各冊大致均勻，對十三經原順序做適當調整，並於每頁以黑口標識，分四冊裝訂，總頁數為 6000 頁。
- 二、本索引為方便使用，在每部索引前置經文，對原附校勘記中的考證內容悉行參考，審慎地采用與經文有關並被學術界公認的內容，例如阮本《春秋左傳》僖公三十三年疑脫“鄭穆公使視客館”語，據內府藏本《春秋左傳注疏》補充備考。對經文字體嚴格控制，盡可能保留古文字學資料，也照顧索引的完整性，力爭不發生一分二、一分三的紛亂狀況，祇對字形相近而意義相同的字進行歸併。對諱字盡量予以恢復。
- 三、經文內小標題，主要集中在《詩經》《周禮》《春秋左傳》和《爾雅》裏。我們將其由文後置改作文前置，原前置者就地前提一行，一律用黑體字單行。原標題下與標題重複的正文刪除，對就地提為小標題之正文則不再補充。《春秋左傳》在“經”“傳”後僅有年代的標題下，加置“【某公】”顯示區別。“【某公】”不參加索引，以便適應查找習慣，並使索引精準而不繁複。
- 四、經文的分段，主要依據注疏的分卷，分節；其次參考傳統解經段落；再其次併合字數畸少的分段，以清爽眉目，方便查閱，也降低書價。
- 五、經文標點，採用底本原有句讀。但為了使索引盡量多提供信息以及節省篇幅，對過短之句讀略刪“讀”點，在不增加語義理解困難的前題下加以連接。例如《穀梁傳》第 34 頁：
 如：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繒人、盟于蜀。
 作：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繒人盟于蜀。

- 六、本索引采用逐字索引方式。索引文句（即索引目標）基本以“句”為單位，間或照顧語義而取以“讀”代句的方式。例如《穀梁傳》第43頁：
 如：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作：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 七、經文頁面的左側號碼，標明其右經文在底本裏開始的頁碼，方便讀者再查《十三經注疏》原書；右側的號碼，則為本頁的自然行數，供本索引查檢正文時使用。
- 八、本索引的檢索字，依王雲五先生的《四角號碼檢字法》排列。四角號碼取法則依1950年商務版《四角號碼新詞典》，四角號碼取前五位，重碼及未收之字依取碼規則酌情插入。對字形變化亦依原規則取碼者有“條”“修”“脩”等字；做適當調整者有“桑”“喜”“嘉”等。索引字在文句中出現，一律遵慣例以“○”替代該字。索引文句據“○”出現位置，再依頁碼、行數次第排列。
- 九、本索引於每一索引句下注出處，例如《尚書》：

1142,孺

○子其朋。2	026/01
○子來相宅。	026/15
○子王矣。	030/34
○子王矣。	031/06
乃惟○子。	026/05
咸告○子王矣。	031/02
公將不利於○子。	021/05

其第一組數字，標明本句在前置經文的頁數；其第二組數字，是所在的行數。其文句尾標有“2”“3”字樣的，是表明同樣句子在該行有兩次或三次出現。索引版面書眉標有檢索字頭及四角號碼，索引字連續四角號碼相同，全部標示，不再刪省。

- 十、本索引附有《筆畫總表》和《四角號碼總表》，囊括每字分別在十三部經書索引中的頁碼和參見的異體字。有必要提示使用者的異體字亦依規則列入《總表》中，請讀者參考。《四角號碼新詞典》中已注明可取它碼者，在索引和總表中不再提示。筆畫排序亦遵照《詞典》，針對新字型做相應改變。最後附有《十三經索引統計表》，與阮元所存統計有出入，供讀者參考。人控制的電腦在這一點上已超過人的計數功能。